

论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教 文 蔚

“七七”事变后的红军改编,是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又比较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红军长期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不能及时了解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因而处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之中。由于这种情况,怎样在顾全抗战大局的前提下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发展人民抗战力量,乃是红军改编中的几大难题。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过程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在鄂豫皖边区得以实现。

一、边区国共谈判的政治基础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但在鄂豫皖边区,国共两党的地方性谈判因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而迟迟不能进行。只是在“七七”事变爆发,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谈判才开始进行。但其政治基础也并不是随着“七七”事变的到来而突然具备的,它有一个酝酿的过程。

西安事变后,虽然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层的谈判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则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即对北方红军以和为主,而对南方各根据地继续进行“围剿”,企图一网打尽。在鄂豫皖边区,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撤销“鄂豫皖边区主任公署”,改设“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任命卫立煌为督办^①,下设岳西、信阳、经扶三个督办处,以强化“清剿”的指挥系统。五月,由蒋介石、何应钦亲自督战,国民党以三十多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边区红军主力部队和便衣队进行全面“清剿”。面对这种

严重局势,边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虽然有所布置,各部队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因敌强我弱及其他原因,红二十八军被迫分散突围,豫南红军游击队转入枣阳、随县、京山、安陆、应山等地进行外线作战,因而未能粉碎国民党的“清剿”。“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边区的国共谈判才能实行。即使如此,由于国民党内战政策的“后遗症”,豫南地区的谈判不得不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僵化状态,直到十一月才得以成功。抗战初期,国共谈判的政治基础,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国共两党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来了,但就鄂豫皖边区而言,还有其特殊的具体的情况。尽管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的时间并不一致,但其政治基础则基本相同。这就是:

首先,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顾全民族大局,对国共谈判主动、诚恳、耐心。

边区红军游击队虽然知道西安事变和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的消息,但知之不详。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两支部队无不设法与党中央联系,以求得到党中央的直接指示。一九三七年春,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派往外线了解情况的美术堂回到了边区。他曾经辗转,在西安七贤庄找到了党中央设立的红军联络处,先后受到联络处处长林伯渠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亲切接见。联络处将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文件及宣传品交他带给红军领导人,并要他通知红军尽量设法和国民党谈判。何耀榜在接到美术堂带回的文件后,决定派交通员找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联系。当时因国民党“清剿”而联络极不易,直至“七七”事变后的第六天,即七月十三日,何耀榜才与高敬亭在皖西岳西县蓝田村会合。当天,高敬亭捧着美术堂带

回来的文件和材料,反复阅读,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谈判。并当即与何耀榜一起召集干部开会,通宵达旦地进行研究和部署。第二天,他又以红二十八军的名义,对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写信,说明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前线战事吃紧,建议双方停战谈判,共同抗日。七月十五日中午,督办公署回复,愿意接受停战谈判的倡议。下午,何耀榜在高敬亭的派遣下在岳西县第三区公所蛇形岗炮楼,会见国民党岳西县办事处的赵参谋和第三区李德保区长。由于赵参谋不了解上级的意图,心怀恶意,致使第一次会谈发生僵局。在此情况下,红军方面并不气馁,仍以抗日大局为重,于十九日继续与对方接谈。此后,经过连续六天的谈判才获得成功。在此期间,高敬亭命令各部广泛动员,紧密配合地方各级党组织,散发有关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传单、标语,以促进谈判早日成功。

在豫南桐柏山地区,红军游击队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希望尽快在该地区实现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中共鄂豫边省委将红军游击队整编为“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由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委,以适应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关于国共谈判,早在五月间周骏鸣在延安参加白区党代会时即请示朱德。鉴于国民党还在豫南地区“清剿”,朱德指示:“你们猛烈地扩大,扩大到消灭不了你们,他们就会同你们谈判的。”②九月中旬,胡继亭、林维先带领红二十八军一部到达信阳尖山地区,与豫南游击队会合。于是两军协同作战,于九月十七日前先后拔掉泌阳县马谷田、邓庄铺两个反动据点。至九月底,游击队扩大到三百余人,声威大振,国民党妄图消灭豫南红军游击队的阴谋破产了。在此情况下,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找豫南红军游击队进行谈判。在十月底前后进行的三次谈判中,尽管每一次都因国民党地方当局心怀叵测、欲借谈判之机剿灭红军而使谈判归于破裂,但在每次破裂后,红军并不因此拒绝再次谈判,仍从民族利益出发,一方面揭露他们的阴谋,晓之以理,一方面则耐心等待他们的悔悟。在与国民党河南省民军总司令张钫进行的第四次谈判中,由于鄂豫边省委统战部部长刘子厚的继续努力,终于使谈判获得成功。

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际,边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不计旧仇宿怨,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击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这种伟大的胸怀

和可贵的革命气质是谈判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其次,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存在是边区国共谈判的重要政治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大特点,是国共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结成的军事联盟。边区谈判成功与否以及成功的速度,直接决定于双方主要军事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受蒋介石排斥的国民党军队谈判代表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以与蒋介石的嫡系势力相抗衡,愿意与共产党谈判合作。尽管他们企图在“合作”中将共产党的军队收编或加以种种限制,但它在客观上促成了两党的谈判。

在鄂皖边,国共两党的谈判,由于共产党人的主动在七月二十二日正式开始。当时,卫立煌没有直接出面参与谈判,而是派他的高级参谋少将刘纲夫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卫立煌不属黄埔系,也不是江浙籍,自然不会轻易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这种处境不能不影响到他的下级官员。刘纲夫便觉得“跟随卫立煌的人,更是无出头之日”③。“七七”事变后,刘纲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有所不满,深感蒋介石“阴险奸诈已极”,对他不必寄予空想,而正处于彷徨之中。当卫立煌通知他以全权代表资格与红军谈判时,他认为“这是一个新局面”,应“力主停止内战,抗日雪恨”④。在谈判过程中,刘纲夫的许多言行虽然是从国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但态度比较诚恳。鄂皖边的谈判能在六天之内达成协议,总算比较顺利,这与刘纲夫的努力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豫南地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虽然顽固,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国难深重之日,某些国民党县级官员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满意,不愿打内战了。在第三次谈判时,国民党代表承认他们打内战是奉上级命令行事,他们自己不愿意打。认识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的罗山县县长还亲自开介绍信,派人送红军代表到开封谈判。刘峙见到红军代表时没有阻挡,要红军与张钫谈判。张钫原是国民党二十路军总指挥,有两个师的兵力。一九三二年被蒋介石调往鄂豫皖边境“围剿”红军,被歼灭了大部。后又调往江西、福建,死于战事和水土不服者甚多⑤。此后,张钫虽仍打着二十路的旗号,但是个“光杆司令”,对蒋介石大为不满。西安事变时,身在江西临川的张钫曾计划派人去西安劝杨虎城赶快杀掉蒋介石。后来,蒋介石为了笼络他,赠给他一个“河南省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张钫这个民军总司令仍没什么部队,便急于要找部队充实自己,发

展他的实力。所以,红军与张枋的谈判迅速地达成了协议。当然,红军不会上他的当,特规定“听编不听调”,他也愿意,因总比当“空军司令”好。”

再次,边区的国共谈判还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西安事变后,因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影响,边区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忱不断增高。在豫南,鄂豫边省委先后与北方局、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对全国形势逐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上层的、下层的、上下层的民族统一战线”,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争取他们抗日。于是,他们根据西安事变时东北军的政治态度,对受蒋介石逼迫、被调往豫南进行“清剿”的东北军一部进行统战工作,颇有成效。一九三七年春,鄂豫边省委派李子健在泌阳与东北军周福成师王理环团长及师部一个参谋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东北军提出不断向红军提出情报,支援红军枪弹,不侵犯群众利益。红军提出不封山,山货柴草上市,公买公卖^⑥。后来,这种统战关系虽然被蒋介石的嫡系势力所扼杀,但在豫南各阶层人民中留下了一定政治影响。

农民是边区的基本群众。当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时,长期在党教育下的鄂豫皖革命老根据地的广大农民群众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七七”事变前后,在泌阳东部的广大地区,农民抗日自卫会的群众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⑦。这种组织虽然在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形势下不可能将主要力量用于抗日救亡工作,但它为以后开展抗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与地方开明士绅建立统一战线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各阶层。周骏鸣从延安返回边区后,根据党中央关于要和当地开明士绅和政府建立统战关系的指示,积极进行对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确山中集一位姓宁的开明士绅,在听了红军宣传的抗日救国道理后,主动将一千块银元送给红军作为抗经费,并将他侄儿送到红军部队参加抗日。在鄂皖边,红军和便衣队采取了打击和镇压最反动的保甲长与地主士绅,争取中间态度的保甲长与地主士绅的策略方针,最大限度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和阵营,为以后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豫南地区,国民党杂牌军多是利用土匪来扩充他们的部队的。红军在消灭和争取改造土匪的斗争中,把危害人民的股匪与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农民区别开来,把土匪头子、惯匪和匪众区别开来,促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参加抗日。在邓庄铺,红军通

过愿意抗日的国民党联保主任李耀堂去作土匪的工作,宣传全国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争取一千多名匪众投向红军和人民。

从上述情况来看,鄂豫皖边区的国共谈判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正因为如此,国共两党举行的谈判才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从而获得成功。

二、为联合而斗争, 以斗争求联合

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是因“共产党输诚”而“收编共军”,企图在统一战线内控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边区国共谈判中,国民党为达到这一目的蓄意制造事端。在此情况下,为联合国民党抗日,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势不可免。在谈判和红军改编过程中,共产党代表主要在下列问题上与对方进行斗争,以保证谈判的进行和协议的签订,使红军的改编得以实现。

第一,识破和粉碎国民党的军事阴谋。

在战争环境中,政治上的谈判是以军事为后盾的。只有保持高度的警惕,才能处于主动地位。七月十六日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奉南京政府之命派代表参加谈判。但同时却以王修身为师长的三十二师及保安团将红军包围于岳西县的鹞落坪、大岗岭、蓝田村一带,妄图以武力逼迫红军向其屈服、投降。十九日晨,何耀榜向国民党代表提出质问,坚决要求对方军队后撤二十里后方可谈判。经国民党代表回去请示后,国民党军队按照红军要求撤离,于是红军同意在岳西县城举行谈判。

解决停战问题是谈判的首要条件,“这就需要有一个由双方组成的‘停战委员会’”。二十日,经过协商,停战委员会组成,国民党方面由刘纲夫为正式代表,安徽省政府派来的郭副官和李区长协助之。红军方面由李主任(高敬亭之化名)负全责,由何耀榜为代表。为了防止国民党在红军集结途中采取军事行动,红军代表在协议中提出,“我军进驻七里坪途中,友军不得堵击追击。如果发生冲突由国民党政府负责。”^⑧但协议毕竟是纸上的东西。此后,高敬亭在鹞落坪召开干部会议,强调要严防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为确保部队安全集结,还仔细研究了进驻七里坪的具体行军路线,并规定准备干粮,途中尽量不做饭,以节省时间,早日抵达目的地。

按照谈判时的协商,红军进驻七里坪之前,国

民党军队必须全部从这里退出。但红军抵达七里坪附近时,国民党一〇三师一个团并未退出。经交涉,国民党地方当局说是湖北省政府和武汉行营要派黄冈专署专员兼黄安县县长程汝怀来解决问题。程汝怀到七里坪后,首先请高敬亭及其随同人员赴宴。但在赴宴前夕,一〇三师和保八团在七里坪赶筑了多项巷战工事。这次请宴纯属阴谋。但若不去,对方借口红军不要七里坪,再想进驻就很难了。最后决定派何耀榜去,而高敬亭率部埋伏于七里坪的重要地段,相机行事。由于防卫严密,国民党军队处于被动地位,不敢妄动,程汝怀才答应国民党军队撤出。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新四军军部命令四支队东进皖中、皖东地区投入抗日战斗。为了防止意外,四支队分梯队东进,从七里坪、宣化店、黄陂站和竹沟出发,经过不同的行军路线,于四月间到达中心集结地安徽霍山县流波疃,经半月休整后继续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第二,在红军集中时间和集中地点问题上的斗争。

从七月二十二日开始的在岳西青天畈的谈判,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红军的集中时间问题。国民党方面限红军一个月内集中完毕。而红军代表则提出最好确定五个月集中完毕。

从实际情况出发,红军要在一个月内集中是不可能的。当时,红军和便衣队分布于鄂豫皖三省边区的二十多个县^⑨。红二十八军主要部队的分布地区尚可知,但零星的红军游击队、便衣队究竟在哪处深山老林,高敬亭、何耀榜等人也心中无数。因为经国民党多年“围剿”,红军和便衣队多次被分割,变化极大。且又活动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梗塞,联络困难。其次,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残杀了无数的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现在突然又要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处在偏僻地区的红军指战员一时难以想通,作好思想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

在高敬亭和何耀榜的再三坚持下,经过双方反复的协商,国民党方面才同意增加红军集中的时间。七月二十八日协议签字时,“督办”提出的条款中写道:“鄂豫皖边区所有红军、便衣队集中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⑩

国民党方面急于要红军集中,是因为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目的之一是想借日本之刀削弱共产党力量。当然,抗日卫国是共产党的天职。在高敬亭等的努力下,至九月上旬,大部分红军游

击队被召集到七里坪一带,较好地完成了部队集结的任务。

在青天畈谈判中,讨论的主要问题还有红军的集中地点问题。卫立煌提出以岳西九河为中心的地区,高敬亭、何耀榜提出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的地区。红军代表之所以坚持以七里坪为中心集结部队,这是因为,七里坪四周是高山,可攻可守,驻防安稳。该地区人口稠密,又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发源地。在这里集结,可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帮助,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发展抗日武装。

经过反复协商,国民党代表同意红军在七里坪一带集中。但红军能否进驻仍成问题。青天畈谈判时,“督办”之所以最后同意红军在七里坪集结,是因卫立煌要边区红军尽快退出安徽省,但能否进驻七里坪,还得与湖北省政府和武汉行营商量。九月上旬,刘纲夫一到七里坪,程汝怀和地方士绅多人因对红军怀有旧仇,要求高敬亭部另选集合地点,退出七里坪。刘纲夫深知进驻七里坪一事在岳西谈判时红军代表即坚持到底,况且现在已是既成事实,如何能变?只好照直说:“这事协议上双方签过字,不是你我所能变更的。”程汝怀等人讨个没趣,只好作罢。

第三,在番号问题上的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党外合作,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形式,由此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军队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表面看来,军队的番号只是个形式问题,即打着什么旗号的问题,但番号并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东西,它归根结底要涉及到军队的领导权、性质以及独立自主等根本问题。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在番号问题上经历了多次的斗争。

青天畈谈判之前,国民党以重兵包围红军时即散布“若归顺国军,官晋一级,给优厚薪俸”。妄图以官位、金钱引诱红军干部交出军队。谈判时,又提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高敬亭、何耀榜从他们自己的习惯认识出发,坚决不同意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番号,而坚持要改编为“工农抗日联军”。经过斗争,国民党同意暂定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受共产党领导。因处理重大问题要报请党中央批准,所以在协议中红军方面提出,“凡属全国范围的问题由两党中央决定。我部番号亦由两党中央决定”^⑪。

协议签订后,刘纲夫去南京向卫立煌汇报谈判情况。卫立煌说,已呈请任命高敬亭为“抗日联军

挺进军司令⁷，并要刘纲夫留宁领取高部给养、被服、弹药及委任状和关防^⑫，然后经武汉行营去七里坪。刘纲夫到七里坪，明明从武汉行营方面得知高敬亭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却偏要宣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高敬亭的委任状。而有山头思想和居功骄傲情绪的高敬亭竟然接受了委任状。不几天，党中央代表郑位三等来到七里坪，指示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委任。后乘刘纲夫醉酒的时刻将委任状退还给他，使国民党的收编阴谋破产了。

豫南红军游击队的代表刘子厚在与张钫谈判时，因用张钫部队的番号是张钫同意谈判的前提，不能改变，故从实际出发，提出三条原则：一，接受张钫的番号，但不受张钫调动；二，干部由共产党派；三，张钫为红军提供给养^⑬。对于这三条，张钫开始不同意，认为这样作都对红军有利。刘子厚则坚持，认为这样作是对抗战有利。经过多次协商，张钫终于同意了红军提出的条件。在谈判期间，刘子厚等得知武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也在武汉，经王国华、周骏鸣同意，派张明河去武汉汇报。这时，党中央已与国民党达成了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周恩来等在听取张明河的汇报后，将豫南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⑭。张明河离开开封时，与张钫的谈判还未就绪，张钫还未接受“听编不听调”的改编原则。当张钫从周恩来的电报通知中得知豫南红军改编后的编制时，认为大势已定，也就算了^⑮。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在此前后，董必武、叶剑英先后从武汉来到七里坪，检查红军的改编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叶剑英还通知高敬亭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会议。二月中旬，高敬亭在武汉向周恩来等汇报了与国民党谈判及红军改编情况，并会见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高敬亭返回七里坪后，根据周恩来在武汉的指示，将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全支队三千一百余人。

三、坚持发展人民抗战力量

红军改编不是一个单纯的编制问题，它负有更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是一个同床异梦的朋友。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即提出在抗战中要削弱共产党力量

的五分之二。在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中，不少人对于国共合作在思想上一时难以转弯。因此，红军的改编欲适应新的战争环境和政治环境，必须努力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必须以战略眼光为改编后的各项重大工作打好基础。总之，只有多方面地发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力量，才能进行人民战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在这方面，边区红军在改编过程中主要抓了整训、扩军和建立留守处的工作。

整训。由于四支队是在内战时期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组成的，这支部队经过长期的战争，“干部完全缺乏，对于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均受极端困难”^⑯。同时，部队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对于许多新东西还茫然无知，加之长期处于分散的游击状态，没有条件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因而在思想认识上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为了全面提高部队对抗战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增强战斗力，以适应东进抗战的需要，边区红军游击队利用集中和暂时的和平环境，从思想上和军事上进行了全面的整训。

在七里坪，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开始，根据长江局的指示，由中共湖北省工委派方毅主持，先后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和抗日青年训练班（统称七里坪训练班）。前者训练集中起来的便衣队，后者训练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学生。训练班开设了《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唯物辩证法》等课程。主要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同时，对于游击战争的理论也非常重视。一九三八年初，董必武和叶剑英先后视察七里坪时，向红二十八军和训练班学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抗战力量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和学员们的抗战热情。党中央还先后派袁鹤亭、郭述申、彭康和戴季英等来到七里坪，指导红军和训练班的工作。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回到部队讲授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广大指战员澄清了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抗战形势和任务，为部队的改编和尔后东进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军事整训中，部队普遍进行了队列训练和游击战争的战术、技术训练，掀起了练兵热潮；并且组建了教导队和新兵营，分别培训部队基层干部和新兵，使之尽快提高作战指挥能力和杀敌本领。

豫南红军游击队也进行了集中整训。一九三八年二月，由于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纷

纷南退，中原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开辟华中抗日战争战场，党中央命令彭雪枫率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六十余名干部来到竹沟，帮助整编四支队第八团。此时，由于大批爱国青年涌至竹沟，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和革命队伍，需要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对分化争取过来而加入军队的匪众也要加以教育和改造。于是，由周骏鸣带部队到新集整编，由彭雪枫等负责以河南省委名义在竹沟举办教导队和新兵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游击战争的理论，还在山林间进行军事训练。

扩军。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四支队在整训期间，利用谈判后的有利条件，独立自主地进行了扩军工作。

八团的扩军对象除了积极要求抗日的青年农民和学生外，就是可以改造好的匪众。在豫南地区，有安新祥、段永祥两股较大的“杆子”（土匪），各有七、八百人，被称为“安团”、“段团”。他们到处骚扰，闹得民怨沸腾。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彭雪枫等以联欢请宴的方式解决安、段两头目，解除匪众武装后，对要求抗日的匪众实行改编，并将延安派来的干部调到这个部队中去，加强领导力量。在红军改编初期，部队编成一个营有余，但不够一个团。由于改造了安、段两团，将其整编为两个营，充实了八团，发展了抗战力量^①。

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一带集中后，以各种方式在村镇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战主张，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同时，还将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编入主力部队，扩大了抗日武装。

经过努力，边区扩军工作成绩显著。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集中在七里坪的部队（含便衣队和地方武装）只一千八百余人。翌年初，经过扩军，达到了二千余人。此时，连同豫南的部队，共二千八百余人。由于继续扩军，二月中旬正式改编为第四支队时，支队总人数为三千一百余人，成为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队^②。

成立留守处。为了使与敌战斗中的伤病员（特别是残废军人）得到适当疗养，安置官兵家属，并有一个与后方进行通讯联络及与地方当局办理杂务的机关，也为了打破国民党要求我军全部集中的阴谋及王明所谓“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的右倾论调，红军在改编即将完成而尚未出征抗日之际，即着手在七里坪和竹沟筹建后方留守处。

竹沟地处中原前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九

三七年七月，朱理治离开延安赴河南工作前夕，毛泽东指示说：“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③在竹沟设立四支队八团留守处，是经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同意，并由周恩来等向蒋介石报告得到批准的^④。彭雪枫为主任，朱理治兼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留守处有一支四十余人枪的警卫部队，后豫西特委又派来三百多人组成一支武装大队。竹沟留守处为发展人民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掩护党的活动方面，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三月，中共豫南特委（由鄂豫边省委而来）和中共河南省委先后迁到竹沟。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这两个党组织就是在八团留守处的合法名义掩护下开展各项活动的。在为开辟抗日根据地输送骨干队伍方面，留守处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动员大批青年农民参军，并继续培训干部，提高党组织和部队的质量。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从这里出发赴皖中、豫东和豫鄂边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骨干队伍共四批，计一千五百人左右。

在七里坪，根据周恩来、董必武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达成的协议，设立了四支队留守处，詹义金为主任，熊作芳任党的支部书记^⑤。留守处组织了一个排的武装力量，罗厚福任排长，张体学任政治指导员。七里坪留守处是党在武汉与皖西、豫南进行联络的一个重要据点，它先后掩护湖北省委和鄂东特委的活动，并在培训干部，扩大抗日武装，继续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

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是新四军组建史上光辉的一页。边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以及集结整训和开赴前线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警惕，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接连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歼灭、收编等各种阴谋，并将改编与抗战思想动员、培训干部及建立战略支点结合起来，从而较好地完成了人民军队由反内战到反侵略的伟大历史转变，为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争取人民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① 《中央日报》1937年4月28日。

②④ 周骏鸣：《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河南文史资料》第七辑。

③④⑤ 刘纲夫：《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参加鄂豫皖边区和谈前后的回忆》，1961年6月1日（原件存

江苏省政协)。

⑤ 范龙章等:《张钫与二十路》,《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⑥ 李子健:《中共鄂豫边党艰苦年代创业纪实》,《革命史资料》第九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⑦ 董中玉:《中共鄂豫边区党史简述》,《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⑧⑩⑪ 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回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⑨⑬ 《鄂豫皖边区情况简报》1937年9月9日。

⑬⑮ 刘子厚:《谈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南的革命

活动》,1983年11月8日。

⑰ 张震:《从临汾到竹沟》,《燎原》第一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

⑱ 第一支队2300人,第二支队1800人,第三支队2100人,第四支队3100人,军直属队980人,全军共10300人。

⑲ 朱理治:《有关河南省委、中原局及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的一些情况》。

⑳ 彭雪枫:《关于竹沟事变》,1940年3月8日,《解放》周刊1940年第一〇一期。

㉑ 熊作芳:《回忆六大队成立前后简要经过》,1980年1月12日至17日。

(上接71页)

是注定要失败的。拿破仑、威廉二世、墨索里尼、东条英机都妄图称霸欧洲和世界,最后一个一个都走向了坟墓。世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因为德意日法西斯的破坏而停止不动了,而是越过战争的废墟滚滚前进。尽管历史有出现曲折的可能,但这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或大或小的漩涡。从历史的整体看,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热爱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是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最终走向和平,走向进步,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注释:

①⑬ 见198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②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3页。

④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伦敦1967年版,第283页。

⑤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中译本,第216页。

⑥ 巴特儿:《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中译本,第213页。

⑦ 乔冠华:《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⑧⑫⑯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4、250、932页。

⑨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伦敦1971年版,第24页。

⑩ 《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

⑪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⑭⑯ 胡耀邦同志在澳大利亚访问时的讲话,见198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⑮⑰⑱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单行本,第28、22、22页。